



黄亭子札记

单兵教练

王凤生

与一位教师聊天，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，“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是搞艺术的，有琢磨人的习惯”。接下去他说，“你在台上讲话，我就在台下琢磨你，发现你这个书记满嘴蹦出来的尽是电影名词”。我不是想用他的话来炫耀我多么懂电影，而是想以此来说明在电影学院工作是需要学习电影的，至少可以多些共同的语言，缩短彼此间的距离。

在基本上确定了去电影学院工作的那一年的暑假，我便开始了仓促的准备。“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”从清华图书馆借来了普列汉诺夫的《论艺术》，这本书以前曾经读过，对一些章节仍留有很深的印象，现在又重读，当然希望能有新的收获。除了向书本请教，还向人求教。1991年8月13日晚，我向北京广播学院（现中国传媒大学）高晓虹老师了解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，因为这两所学校同属广电部，彼此相互了解。在清华，当时对电影颇有

研究的当属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影《邻居》，就是由他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马林共同编剧的。他还写了若干电影方面的专著。8月29日上午和9月20日上午，我两次请他为我讲解电影和介绍电影界的情况。我边听边记笔记，他讲的许多都是我所不知的。他送我《电影艺术讲座》，在那个暑假我认真地读了这本书。其中夏衍的“讲话”，罗艺军的“中国电影评论概说”，汪流的“电影剧本的结构形式”，郑洞天的“电影导演”，倪震的“电影造型”和谢飞的“《战舰波将金号》”等是我深入阅读的几篇。我还读了艾知生同志送我的电影学院校友写的回忆录《北京电影学院四十年》，让我了解了更多电影学院的历史与现状。

每周几次的影片观摩是教学的重要环节，许多毕业生都谈到影片观摩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几乎每次不落地和

学生一起观摩影片。一次去听苏牧老师的课，他系统分析讲解头一天晚上的观摩影片《危情十日》，使我加深了对于影片的理解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在家观看从学校资料室借来的名片录像带（那时没有或少有光盘）。再一次做学生，跟随一个学生班系统听课，从头听到尾，认真记笔记，课后复习。有的课程不可能随学生班从头听到尾，我就有选择地挤时间去课堂听课。表演系的课，表演90班的课我听的较多。观摩齐士龙老师指导学生排练剧目，他们每一次的汇报演出都请我去看，因此和这个班的学生如黄磊、王劲松、姜武、张辉、贾妮、钟平等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，和他们交了朋友，有的至今还有联系。这种听课既是学习，也是认识老师、了解教学情况、与学生交朋友的好时机。课间聊天，谈问题、提建议，使我知道了许多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情况，既真实又具体，十分难得。

下摄制组，是一个学习掌握电影摄制全过程的绝好途径。院属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《冲天飞豹》，反映驾驶“飞豹”战机试飞员的精神风貌与牺牲精神。其中一个外景地是某空军试飞基地。我去摄制组几天，在拍摄现场与导演、摄影师、美工师、演员接触，学习电影摄制过程；拜访飞机设计师——一位解放前毕业的清华老学长，这里不便写出他的

名字——在他的办公室里，双重的关系使我们谈话甚欢，还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。与试飞员交谈，他们的自豪感，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，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我。

谈到我学习电影，不能不说到孙明经老先生。他是一位对我国的电影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。孙先生原在金陵大学任教，1938年他创建电化教育专修科，后改为影音部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他带领金陵大学影音部师生和设备并入北京中央电影学校（北京电影学院前身）。在我到电影学院工作的1991年，他已80高龄，在家休养，但他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工作。在我到电影学院不足一年的1992年，他便离我们而去了。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他通过各种途径关心和帮助着我。

在上班后不久的10月4日下午，我去图书馆。它不是独立的建筑，在教学楼内的东半部分，只占下面几层楼，藏书18万册。面积不大的外文期刊阅览室，除了工作人员，没有见到一位读者。我问工作人员这是为什么？她回答我说，“学生的外文不行”。“那老师哪？”“一些老师的外文水平也有限。”我顺便说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这里的学生总是满满的，那就好了，说明我们的教育质量有了提高。”10月9日全院教工大会，讲话中我提到了这件事。孙明经老先生双目几近失

明，在家里向他的儿子询问新来书记的讲话内容，在听到他儿子复述完我的讲话之后，拍着桌子，水从跳动的杯中溅出，他激动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！”说明他赞同我的看法。

他教给我怎样学习电影，对他儿子说：“他们会欺负他的”（指我不懂电影）。他在纸上画了12个方框，要他儿子转告我，电影并不难，弄清这12块就清楚了。只可惜这份珍贵资料我始终未能见到过。但是他的“12个方框”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照他的办法去学习电影嘛。

我遵循他分块的思路，依据导演、表演、摄影、录音、美术、剧作、电影理论、电影管理等学科的划分，请老师到我办公室为我这个初学者讲课，每次半天，实行“单兵教练”。老师讲，我边听边记笔记，不懂的就问，与老师讨论。这些笔记我珍藏至今。办公室的茶几上我准备了一盒饼干、咖啡外加伴侣。这是我付给老师的“课时费”。

年过六旬的周传基老师在学校里有很高的威望，对于电影理论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，在办公室里为我讲完了还不够，还把我带到拉片室，边“拉片”，边讲解，边向我提问，要我回答。就我们两个人，下班时间过了很久，别人都早已离校，我们才下课。课后他还几次送给我电影及电影教育的文献资料，有的还是很久以前打字油

印的，有的是他正式出版的专著、译著，如由他翻译的美国诺埃尔·伯奇著的“外国电影理论名著”《电影实践理论》，他与周欢合译的美国托马斯·沙兹著的《旧好莱坞/新好莱坞：仪式、艺术与工业》，他的专著《电影·电视·广播中的声音》，《视听语言教程》等。后来，在给学生们讲课的课堂上，他问学生：“我讲的你们都懂吗？我看你们是没懂。”“你们知道谁是我的最好的学生吗？王凤生。人家学理工的，我一讲人家就懂。”这些是听他讲课的学生告诉我的。因校园小，学校不允许出租车进校，一次他乘出租车进校，门卫阻止他，由此发生争执，刚巧被我撞见，他执意不肯让步，我破例同意了他的要求。他对学生说，他是经过我批准的全校唯一一位可以乘出租车进校的人，这是的确的。

刘一兵、戴锦华老师等都先后给我上过这样的课。

这样的“单兵教练”，是“吃小灶”，也算是一种“特殊化”吧。它对于我学习电影有很大的帮助，也是增进我和老师间的感情，交换看法，咨询学校工作的好时机、好场所。每一次授课完毕，老师们边享受课时费的“待遇”，边和我聊天，谈看法，反映问题，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建议，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是我在其他场合听不到的。“单兵教练”是令我十分快慰的一件事。✎